

## 在京新生代农民工社会 适应研究报告

卢晖临\*

### 摘 要:

本报告研究焦点是北京有一定根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考察他们在城市的工作与生活情况，在此基础上，描述和概括其社会适应（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的不同状态和特征。报告指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城市融入呈现出多层次及发展不平衡、不同步等特征。相对而言，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快于制度融入、文化心理融入。

### 关键词:

农民工 社会适应 城市融入

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农民大规模由乡村流入城市。受城乡二元壁垒的影响，农民工正在成为一个人数将近两亿的特殊群体。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进一步释放，这一群体呈逐年扩大之势。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人口集中流入地，外来人口已经集聚成相当大的规模。2000年以来，北京市流动人口总量一直呈现高速增长的势头，年均增长70万。根据北京市统计局数据，2012年，北京市常住人口2069.3万人，其中在京居住半年以上的外来人口有773.8万人，占总数的37.4%。由于户籍制度的限制，广大外来人口在工作、居住和享受公共服务等方面与本地人口存在着明显的差距，并呈现出其自身独特的特征。

---

\* 卢晖临，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农村社会学、历史社会学、定性研究方法。



在当前的中国社会结构中，农民工仍然是被排斥的社会边缘的一群人。首先，与城市居民相比，他们是被局限在次级劳动力市场中的一群人。相对于西方劳动力市场的功能性分割而言，中国劳动力市场的分割在很大程度上受制度因素影响，表现为一种制度性分割（杜鹰、白南生，1997），即城乡二元分割体制与户籍制度所带来的种种制度性限制与歧视使得他们无法与城市居民在劳动力市场上进行平等竞争。其次，虽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我国对原有的城乡分割的二元体制进行了一系列改革，但在子女教育、住房、医疗、养老、失业保险等方面农民工仍然不能享受到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基本被排斥在社会福利和社会保障范围之外（Zhang, 2001；Solinger, 1999；李强，2004；卢晖临，2011）。再次，由于经济和社会身份的巨大差异，加之相互之间的不了解，农民工与当地居民之间总是保持一种冷漠与疏离的生存状态（杨善华，2004），不少城市人仍然用歧视性眼光看待农民工。综合以上因素，农民工已经成为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群体。不仅如此，农民工对于其处境和利益一致性的主观体认也在不断增强。近年来，各种以农民工为主体的民间组织开始建立（如北京的“工友之家”），各种表达农民工观点的“打工文学”开始流行。2004年以来，“天下打工是一家”、“打工打工最光荣”等农民工自己创作和演唱的歌曲成为北京各大建筑工地上最受欢迎的保留曲目，同时，在声势浩大的“讨薪”民工队伍中，“权利”等词语迅速流行。所有这些，都是农民工主体意识逐渐形成的前奏。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农民工的社会适应问题变得尤其突出。农民工的经济活动和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与北京本地居民之间的关系、他们的自我认同、现实与期望之间的落差等问题今后将进一步发展，并将日益尖锐地向现行户籍制度及其附属的教育制度、福利制度等各项制度提出挑战。

与深圳和珠三角等制造业发达的地区不同，在北京、上海这些农民工最早流入并大规模集聚的特大城市，由于城市功能发达产生的对于商业服务业等第三产业的巨大需求，导致流动人口家庭化移民特征从一开始就非常明显。本报告将研究焦点对准那些在北京有一定根基的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不仅考察他们在城市中的工作情况，而且全面考察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情况：居住、社交、

娱乐、子女教育等。在此基础上，描述和概括他们社会适应（社会融入/城市融入）的不同状态和特征。

## 一 “农二代”社会适应状况、特点与障碍

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农民工的主体，农民工群体内部构成与特征的变化使得学者们意识到这将给该群体本身和社会带来新的问题与影响。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研究和讨论大多停留在人口特征方面的描述，并没有对这一新出现的群体的行为模式、生活状态以及他们的价值观念进行深入探讨。而且，既有研究关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研究大多是从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等宏观视角入手考察该群体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与影响，很少有研究从农民工群体的日常生活来探究这一群体的特点。本报告以“农民工二代”群体为重点，据估计，这个群体的规模在北京已经以数十万计。我们自然可以将他们看做新生代农民工内部的一个子群体，他们的身上带有新生代农民工的很多特点，但是由于他们的童年或少年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城市完成，也发展出一些独特的行为特征和情感价值倾向。与老一代农民工和一般的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民工二代”在社会适应方面有着更充裕的时间和更多的资源，因而会比前者进入更深的社会适应阶段。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农二代”的社会适应状况、特点和障碍，是其他外来人口群体在社会适应方面的一个预演，而具有重要的指示器的价值。

### （一）“农二代”群体的基本特征：城市化的务工青年

在以往的研究文献中，外来务工人员经常被称为“流动农民工”：他们身上带有强烈的农民属性，他们如同过客一样在城市打工，辗转流动于各个城市之间，最终回归农村。就“农二代”而言，“流动农民工”这个称呼已严重名不副实。如果要用一个词来概述这个群体的特征，恐怕非“城市化的务工青年”莫属。

#### 1. 城市为本，远离乡村的一代

##### （1）城市为本

调查结果表明，“农二代”平均在京居住年限近12年，与其平均年龄25岁相比，这个群体大约有一半时间在北京度过。其中，在北京出生的比例接近



20%。从居住地数量上看，多达一半的“农二代”从未在除北京和老家之外的地方长久居留（半年以上）。对于很多“农二代”来说，甚至称北京是他们的“第二故乡”都不准确，北京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是他们最为熟悉的环境，是他们最重要的生活世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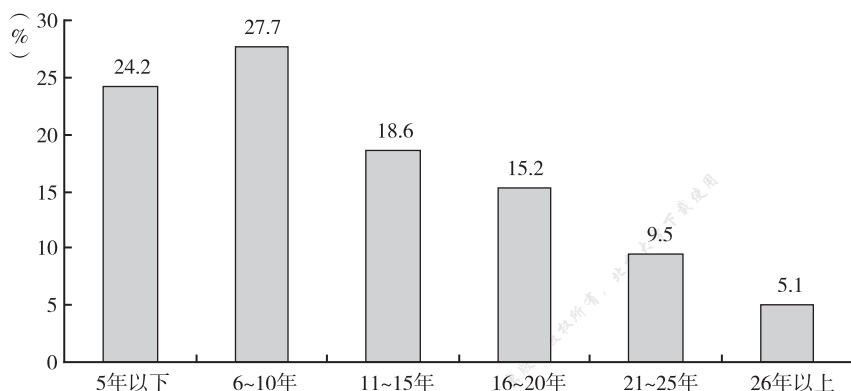


图1 “农二代”青年在京居住时间分布

## (2) 疏离乡村

将近六成的“农二代”不知道老家有多少亩耕地，加上没有耕地的情况（13.8%），我们可以说高达七成的“农二代”已经在现实上和情感上与土地脱离了联系。43.9%的“农二代”几乎没干过或从没干过农活，其中，在北京出生的“农二代”在这一比例上更是接近六成。“农二代”相比第一代农民工脱离土地的程度更深，对耕地概念更为模糊。

总体而言，将近七成的“农二代”与老家仍然维持着周期性联系（每年回去1~2次或每年3次以上），但是，也有超过三成的“农二代”与老家的联系已经非常疏远，他们或者从没有回过老家，或者几年才回去一次（见图2）。对于后一部分“农二代”来说，故乡不过是一个遥远的模糊的概念了，他们甚至写不出故乡的名称：30%的“农二代”写不出老家所在乡镇名，18.5%的“农二代”甚至不知道老家所在的县（区）名。

## 2. 良好教育，看重职业生涯和发展的一代

根据2009年国家统计局调查数据，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新生代农民工教育文化水平普遍提高，初中教育成为主流（64.4%），高中、中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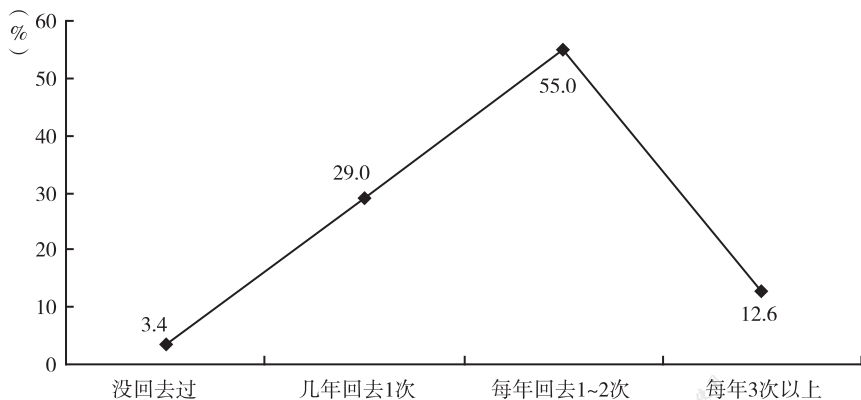


图2 农二代回老家情况

(22.5%) 及大专以上 (6.4%) 也占有可观的比例<sup>①</sup> (2011, 见表1)。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的教育水平有大幅提升。有35.4%的人具有高中学历(含职高、中专、技校)、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占到39.3%,二者合计高达74.7%。如果说新生代农民工是一个“普及初中”的群体,那么“农二代”就是一个“普及高中和高等教育”的一代。这种差别一方面“农二代”和新生代农民工经济状况差异的结果,另一方面反映了“农二代”及其家庭更高的教育追求和更强烈的通过教育改变地位的期望。

表1 不同代际农民工教育程度对比

单位: %

文化程度	第一代农民工	新生代农民工	“农二代”
小学及以下	18.9	6.7	1.9
初中	65.2	64.4	23.4
高中(含职高、中专、技校)	14.5	22.5	35.4
大专及以上	1.4	6.4	39.3

如果与其父母(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就业状况差别非常明显:“农二代”从事个体商贩比例大大降低,由父母亲的三成左右降低到不足二成,而

<sup>①</sup> 国家统计局,《新生代农民工的结构、数量和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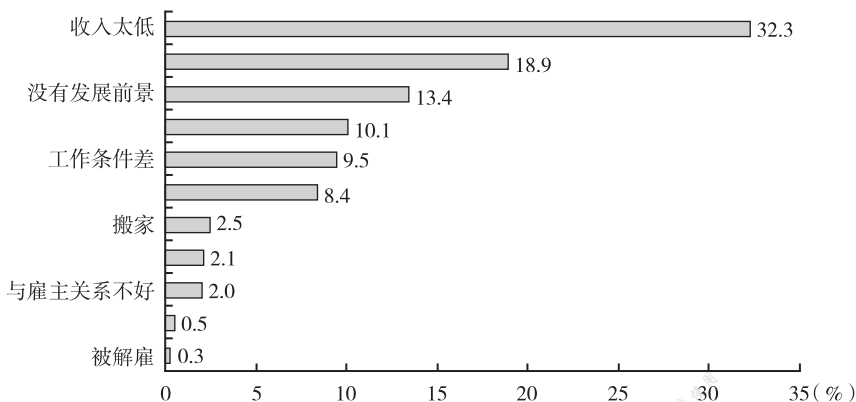


图3 “农二代”最后一次换工作的主要原因

担任普通员工和管理人员的比例大大上升，由父母亲的三成多上升到八成左右。这种差别既是两代农民工受教育水平等客观因素差别的结果，也反映了“农二代”在选择工作时对于体面、稳定性和发展前景等目标的主观追求。尽管“挣钱多”仍然是最有吸引力的工作特征，“符合自己的兴趣爱好”“发展前景好”“工作稳定性高”已经成为“农二代”找工作时考虑的重要因素。深度访谈对象小邱就曾因为工作不符合自己的职业规划而离职：

**[案例材料1]** 小邱第一次进工厂是在流水线上做手机产品，这份工作小邱签了3个月的合同。3个月一完小邱就离开了。因为这不是小邱喜欢的销售类职业，并且工作累又单调乏味，缺少挑战，“消磨意志”，每天只有在工厂工作，然后回厂里睡觉这两件事，他忍受不了这一切而选择离开。

与2012年北京市新生代农民工调研结果相比，“农二代”和新生代农民工一样看重发展前景和工作环境等因素，但相比之下，对工作辛苦程度的判断成为“农二代”择业时更加重要的标准：“农二代”换工作的原因中，“工作太累”成为仅次于“收入太低”的原因。通过深度访谈可以进一步印证，“白领”工作已成为“农二代”比较普遍的追求。“坐办公室”的追求在访谈中也被印证：

**[案例材料2]** 费明曾经做导游，自己找了个中青旅做“包桌业务”（在旅行社门店中租个桌子，自己拉业务），但她最终放弃了这个工作，因为觉得收入不稳定，“太担风险”，后来通过网上投简历找到了一个游戏公司。她觉得“女孩子在办公室比较好，不太累”。

### 3. 家庭完整，追求稳定生活的一代

绝大多数“农二代”的父母双方都在北京，或者有一方在北京（分别为72.2%和24.6%）。接近七成的“农二代”与父（或）母住在一起。

在个人婚姻状况方面，33.9%已婚，28.4%未婚但有男/女朋友。在已婚或有男/女朋友的“农二代”务工人员中，79.3%的人的配偶或男/女朋友也在北京工作，4.9%的人在同一城市但未就业，同城比例高达84.2%，相对来讲这部分人比较稳定。已婚“农二代”中，七成以上已经育有子女。

“农二代”不仅在北京有比较完整的家庭生活，而且维持着显著大于北京户籍人口的家庭规模。调查结果表明，72.5%的“农二代”家庭成员数量在4人及以上，平均家庭人口数至少为4.17人。“六普”数据显示，北京常住人口家庭户平均规模为2.45人，如果扣除其中外来常住人口家庭数，户籍人口家庭规模一定小于2.45人。而且随着“农二代”家庭在北京居住年限的增加，“农二代”家庭人数增加、家庭结构完整的趋势也越发明显。

相对完整的家庭生活和人际关系支持，催生了“农二代”对于稳定生活的偏好和追求，在回答“最希望得到的帮助”问题时，有41.3%的“农二代”被访者选择了“稳定的生活”，位居第一，甚至超过了“平等的户口政策”这一具体可见的目标。对稳定的偏好同样反映在工作行为上。调查显示，四成的“农二代”在北京没有换过工作，加上换工作少于2次的，超过七成的“农二代”属于比较稳定的工作状态，这与清华大学2012年全国新生代农民工调查揭示的“短工化”特征（每份工作平均持续时间1.5年）有一定差别。总体上看，“农二代”的职业流动性较上一代低得多。

### 4. 市民权利意识萌生，行动能力强的一代

“农二代”在北京生存，也和第一代农民工一样，面临着很多困难和挑



战。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他们所追求的生活却和第一代农民工单纯追求收入增加等经济利益有所不同，他们有着更强的融入意愿，也有着更强的权利意识。调查显示，41.3%的人希望得到稳定的生活，有40.1%的人希望得到公平的户口政策，超过了提高收入（34.8%）所占的比例。同时，24.0%的人希望得到平等的教育机会，23.3%的人希望得到医疗等社会保障的帮助，这些都是在城市长期生活繁衍所需要的基本条件。虽然迹象还不是十分明显，但是可以看到，在“农二代”中市民权利意识已经开始萌生，他们不再仅仅将城市作为短期的栖息地，而是越来越考虑长远发展的可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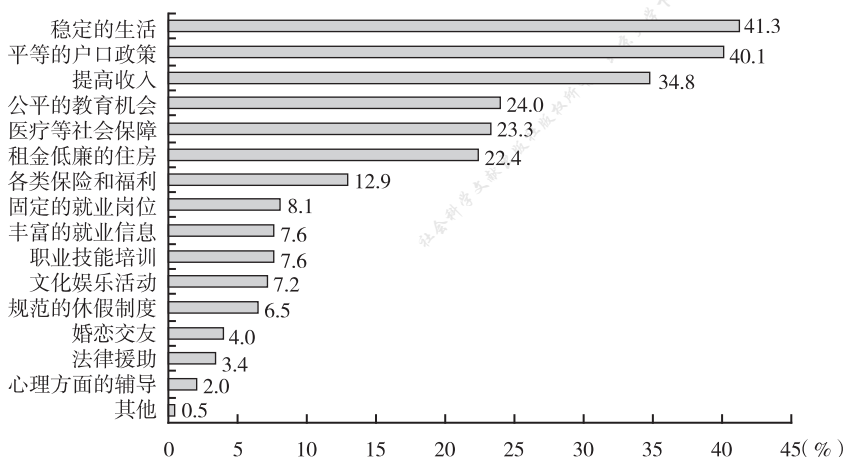


图4 “农二代”最希望得到的帮助

当自身权利受到侵害时，多数的“农二代”选择了忍受（36.3%）或者自己与单位交涉（27.4%），这与第一代农民工、新生代农民工有相似之处。但比较起来，他们有着更强烈的民主意识和维权意识。有23.7%的人选择了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问题，15%的人选择找当地政府部门解决，也有人通过网络曝光（8.5%）等新媒体形式诉求权利。这个比例不仅远高于第一代农民工，也大大超过了新生代农民工。“农二代”的受教育程度高，乐于接触网络，懂得运用新媒体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们是行动能力强的一代。同时，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的维权有着更强的集体意识，有30.9%的人选择联合他人一起交涉，远高于新生代农民工的11.3%。



## （二）“农二代”的物质条件和经济状况

作为“城市化的务工青年”，“农二代”绝大多数以家庭形态生活在北京（单独一人居住的仅占 5.4%），并追求稳定的生活。家庭形态对于住房、工作、收入、社会保障等提出了更高要求。而这些方面的状况，也在很大程度上构成了农民工城市融入的经济基础和物质条件，或者说它们反映了“农二代”城市融入的经济层面。

### 1. 住房

调查结果表明，“农二代”平房独租、楼房独租和自购房的比例达到 56.5%，居住在集体宿舍的比例仅为 11.7%（见图 5）。这种居住状态与十多年前的第一代农民工不可同日而语，根据吴维平、王汉生的研究，2001 年，北京流动人口居住在宿舍/工棚的比例高达 41.6%（吴维平、王汉生，2002），狭小和合住的空间不可能为家庭生活提供物质支撑，它是第一代农民工寄居城市、漂泊无根的真实写照。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北京“农二代”居住状况有了明显改善，初步具备了维持家庭生活的住房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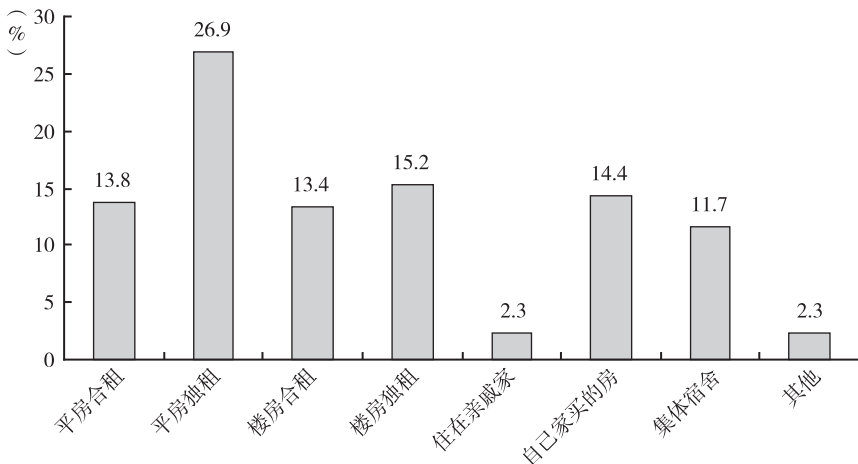


图 5 “农二代”居住房屋性质

“农二代”的住房条件表现出三个特点：第一，自购房比例可观，达到 14.4%；第二，租房比例上升，接近 70%，其中独租比例为 42.1%；第三，



住集体宿舍的比例降低，也印证了前面所说的“家庭较为完整”的判断，“农二代”群体的生活表现出“离工场化”和“回归家庭”的趋势。

然而，调查数据也表明，“农二代”的居住状态与维持一个完整家庭正常生活要求之间仍然存在较大的差距。将近四成的“农二代”是与他人合租或合住的状态。从住房面积看，接近六成的“农二代”居住面积小于40平方米（见图6）。考虑三成左右的“农二代”家庭从事商贩工作，经营场所往往和居住场所合一，再加上家庭平均规模多达4.17人，这样的居住条件与北京城镇户籍人口人均建筑面积29.26平方米<sup>①</sup>的状况相比，较市民一般状况差距显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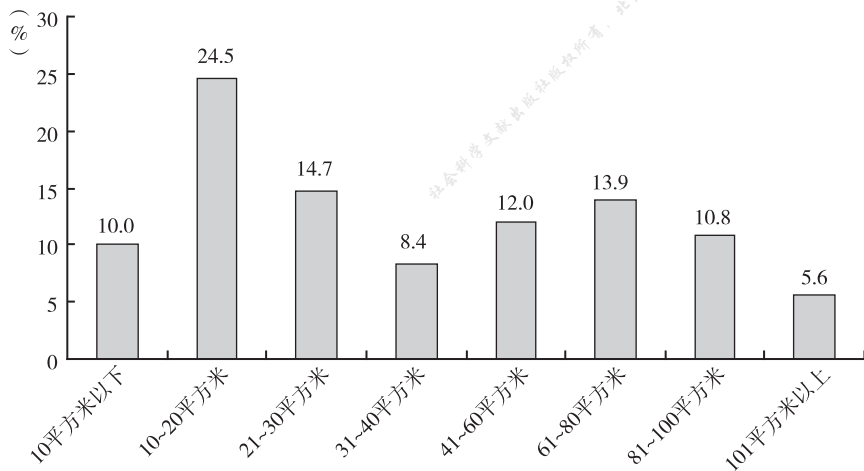


图6 农二代居住房屋面积

## 2. 工作

“农二代”的职业分布主要集中在“各类专业技术人员”（19.7%）、“商业工作人员”（18.8%）、“餐饮服务工作人员”（16.3%）、“其他”（13.8%）以及“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含社工）”（11.4%）这五个职业大类。

不考虑从事小商贩等自我经营情况，“农二代”务工人员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36.6%，对比2009年国家统计局调查结果，新生代农民工未

<sup>①</sup> 陆学艺主编《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201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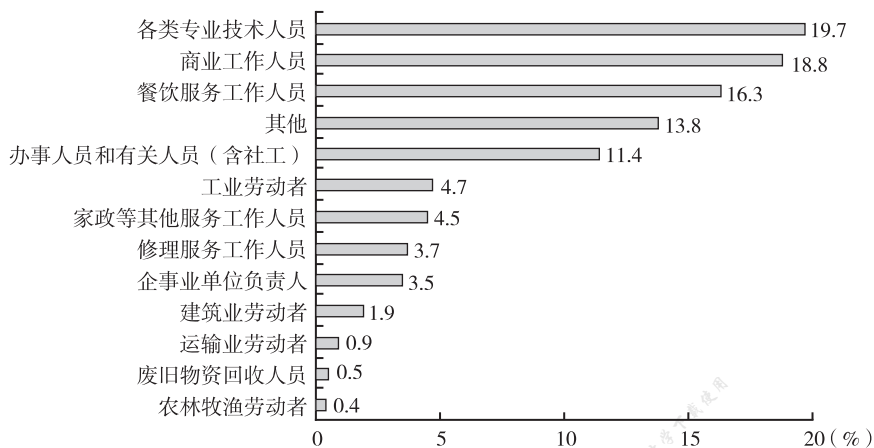


图7 农二代的职业类别分布

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54.4%，第一代农民工未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的比例为 61.6%，可见北京“农二代”的就业保障方面比全国新生代农民工和第一代农民工有了明显进步。

### 3. 社会保障

从全国范围看，雇主为新生代农民工缴纳了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7.6%、21.8%、12.9% 和 4.1%<sup>①</sup>。北京“农二代”的社会保障状况有了明显的改观，养老保险、工伤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的比例分别为 49.3%、44.8%、52.2% 和 37.8%。

表2 “农二代”、新生代农民工社会保障状况比较

单位：%

项目	养老保险	工伤保险	医疗保险	失业保险
“农二代”	49.3	44.8	52.2	37.8
新生代农民工	7.6	21.8	12.9	4.1

### 4. 收入与支出

北京“农二代”务工人员的月平均收入为 3418.62 元，月平均花费为

<sup>①</sup> 2009 年国家统计局数据。



2156.36元，月平均剩余为1273.81元（见图8）。仍有16.8%的人每月金钱没有剩余，说明有一定数量在京“农二代”务工人员生活比较拮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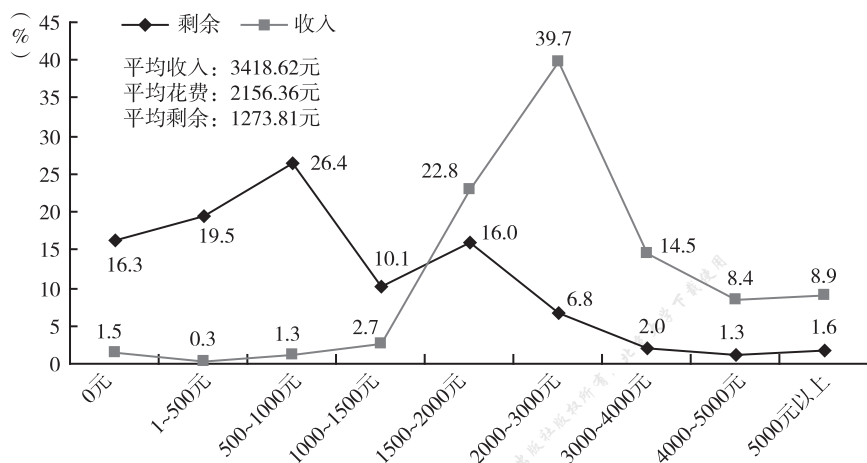


图8 “农二代”月平均收入与剩余

“吃饭日用品开支”“支付房租水电费用”的基本支出是被调查者日常开支花费最大的两个方面，其中，平均房屋租金达到1377.7元（见图9），说明他们整体的收入水平不高，恩格尔系数较高，收入很大部分用作日常生活的基本开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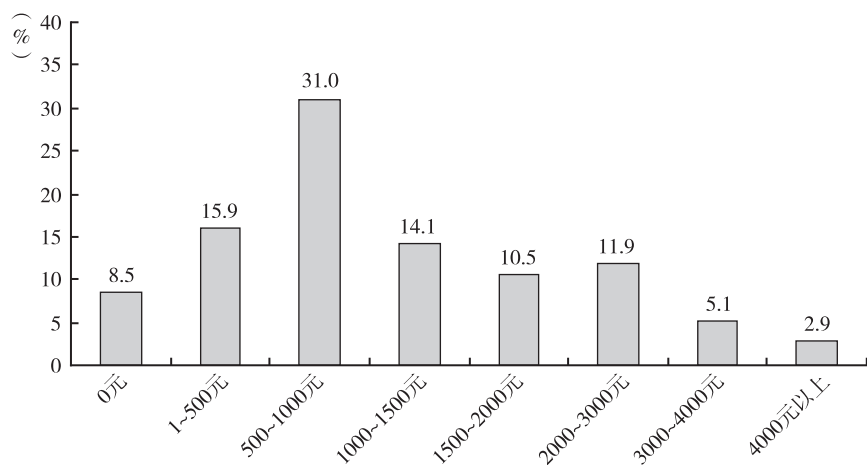


图9 “农二代”每月房屋租金

“农二代”对于自身经济情况的评价比较低，不到30%的人认为自己目前的经济情况不错，大部分人（50.7%）认为只是勉强过得去，还有近20%的人认为自己经济状况不好。“农二代”对自己的社会、经济地位给出了更低的评价，80.7%被调查者认为自己处于社会的中下层和底层。

### （三）“农二代”的城市融入

“城市融入”是一个综合性、系统性的概念，具有多重维度和多重意义。基于传统的移民社会融入研究思路及理论框架，兼顾国内流动人口城市融入的研究成果，我们认为，在前文已经讨论过的经济方面的城市融入之外，至少还可以从三个维度去衡量“农二代”的城市融入。第一是社会融入，包括生活方式、人际交往等；第二是制度融入，包括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参与、城市公共生活参与；第三是文化、心理融入，包括城市认同、身份认同等。

#### 1. 社会融入

##### （1）生活方式

生活方式是衡量城市融入的重要维度，这意味着流动者不仅从理念上认同，而且行为上逐渐按照城市认可的规矩和习俗办事，实践着城市的生活规范，言行举止向当地人靠拢。从农村到城市，事实是一种传统生活到现代生活的转变，这种生活方式的转变不仅仅取决于社会宏观性、结构性、集体性因素的发挥，更多体现在社会群体行为所具有的日常性、行动性、个体性等新的社会化和社会互动过程中。有社会学者指出，城市化的本质即从农村生活方式向城市生活方式发生质变的过程。对农民工而言，生活方式既是他们“城市化”水平的表现，又会对他们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

对于有城市成长经历、城市工作，同时又保持农村户籍身份的“农二代”务工青年来说，他们观念意识的转变体现在日常城市生活中许多微小而具体的细节方面，新的生活方式深刻地影响了群体社会阶层的塑造和形成，制造出他们的“城市性”，同时制造了他们城市生活中社会身份的边缘化。

##### 1) 闲暇时间

在本次调查的“农二代”务工人员当中，一周工作超过5天的比例达到近六成，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0个小时的比例达到三成。从休息休假情况来看，



47.3%的被访对象表示“都能”或者“大部分能”在法定节假日休假，30.9%的人则表示“很少能”或者“都不能”休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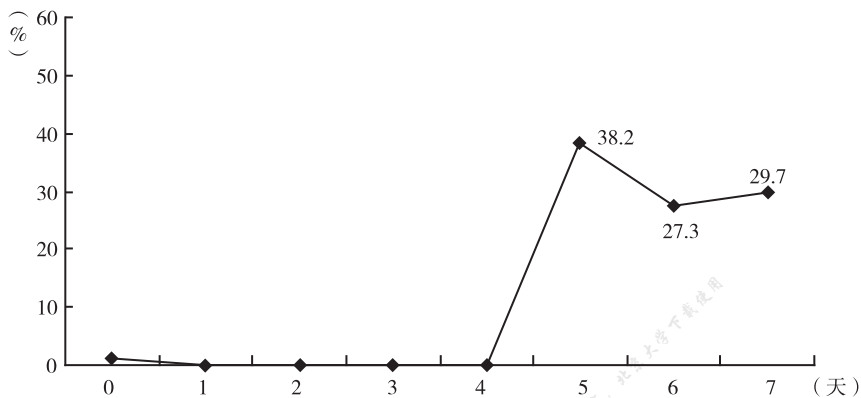


图10 一周工作天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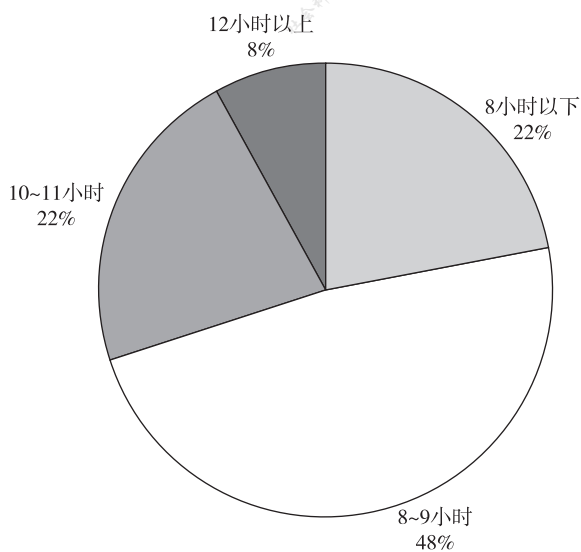


图11 一周平均每天工作时长

## 2) 闲暇活动类型

闲暇活动类型是判断一个群体生活方式的重要方面，“农二代”的休闲娱乐活动呈现以下特点。一是休闲方式的现代化和城市化，这体现在“上网”

这一现代的休闲方式成为该群体的首选（高达 73.7%），而“看电视”、“逛街”和“找朋友玩”作为城市人特别是城市青年人的流行休闲方式在“农二代”中也相当普及。二是由于外来务工青年的工作强度大，“休息”（36.6%）也占据了他们原本不多的闲暇时间中的重要一项，为劳动再生产提供必要的后续保障。三是“做家务”（19.1%）、“帮父母工作”（9.5%）也在“农二代”的闲暇活动中占有一席之地。四是传统休闲方式的式微，这体现在“看书报”、“打牌、打麻将”、“听收音机”这几种活动的比例很低（见图 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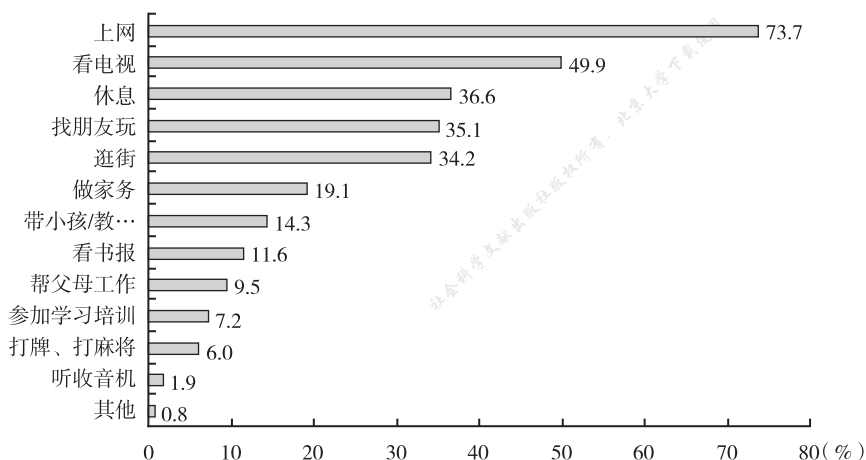


图 12 闲暇活动类型

2006 年国家统计局的一项调查表明，50% 以上农民工的主要休闲方式是看电视、睡觉、看书看报等。第一代农民工由于生计所迫，闲暇活动非常匮乏和单调，与此相比，“农二代”的休闲娱乐变得更多元化也更现代化，逐渐开始从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

## （2）人际交往

人际交往是衡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入的重要维度之一，与谁交往、如何交往、交往面有多宽直接体现外来务工人员的城市融入程度。

### 1) 朋友来源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在京的“农二代”务工青年最主要的朋友来源由高到低分别是同学（27.2%）、同事（25.3%）、同乡（22.1%）。此外，亲戚占



“农二代”朋友来源中的 16.3%，邻居占 6.8%，网友则占 2.1%。根据社会科学的相关理论，通常将亲戚、配偶归为亲缘关系，将同乡归为地缘关系，将同学、同事归为业缘关系。其中，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是传统社会中的主要社会关系类型，业缘关系则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而重要性上升。在“农二代”这里，可以看到，同学、同事的业缘关系已经超越了同乡的地缘关系以及亲戚的亲缘关系，成为这一群体最重要的社会关系类型。

已有研究表明，第一代农民工在城市中的人际交往大多停留在传统的亲缘关系和地缘关系层面，具有内向性、乡土性、规模小、密度高、趋同性强、异质性低等特点，客观形成了与城市主流社会及文化相疏离的现象。“农二代”在朋友关系方面的变化，与其在北京成长、受教育经历密切相关，他们与老家的联系渐弱，人际交往的现代性和城市性进一步增强，对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有积极影响。

## 2) 与北京市民的交往

对外来务工人员来说，与北京本地人的交往，既是衡量他们城市融入程度的指标，也对他们在其他层面的城市融入产生影响。

近一半“农二代”有 1~2 个北京人朋友，近三成人有 3 个及以上的北京人朋友，两成左右没有北京人朋友。在北京上了小学、初中，又回老家山东上过高中、到天津当过兵的访谈对象刘鲁生这样描述自己的朋友圈子：

**[案例资料 3]** 小时候完全作为一个外来户，作为一个民工的孩子，对北京没有什么印象，外地人和本地人各自是一个圈子在生活，你的交往圈子都是外来务工的孩子。直到现在，我的交往圈子也仅限于外地青年，与北京青年交往很少。小学、初中同学都没有联系了，能够联系上的只有老家高中时那一年同学，现在联系的只是部队时候的战友。

尽管“农二代”群体具有一定规模的北京朋友，但对于与北京市民进行交往，仅有 10.1% 的被访对象表示“没有困难”，他们将影响交往的主要困难归结为“思想观念”（68.6%）、“生活习惯”（59.9%）、“地位差异”（51.3%）、“缺少交流”（45.8%）、“被歧视”（45.8%）。从“农二代”群体



的主观判断来看，他们认为与北京人的交往困难主要是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心理层面的非融合感。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他们与北京当地市民的良好互动和城市融入。这一状况在深度访谈中得到印证：

**[案例资料4]** 访谈对象小赵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在被问到原因时，她说：“我不觉得自己是北京人，因为北京人和外地人的思考方式不一样，像我们始终是从外地来的。”

而“缺少交流”也意味着“农二代”群体与北京市民还有更多的交往空间，为其创造交流机会将对这一群体的城市融入产生积极影响。

## 2. 制度融入

制度融入标志着农民工在结构层面城市融入的完成，表现为农民工加入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参与城市公共生活。

### (1) 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参与

本次调研数据显示，61.9%的被访对象表示没有在北京参加任何组织或群体，即其组织化的固定社会参与为零，而其余各类组织的参与率也都在10%以下。“农二代”参与率最高的社会组织为“志愿者组织”（9.4%），其次则为“同乡会”（6.8%）、“党团组织”（6.1%）。工会及职工代表大会的参与率仅为5.4%及2.9%（见图13）。

社会组织及群体是外来务工青年在城市中获得归属感的重要来源，从当前情况看，“农二代”对这类组织的参与度还很低。考虑被访对象在政治面貌上有33.7%的人为共青团员，7.9%的为中共党员，但其真正参与到党团组织中的比例仅为6.1%，可以说党团组织的工作在该群体中还有较大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 (2) 城市公共生活参与

总体而言，调查对象对于社区举办活动的参与度不高，仅有3.3%的人总是参加。另外又可以看到，参与社区活动的频率与“农二代”的城市身份认同呈正相关，社区活动参与越频繁，越有可能认为自己是北京人。这一调查结果与以往理论及研究是一致的，例如许传新等根据2006年进行的“成都青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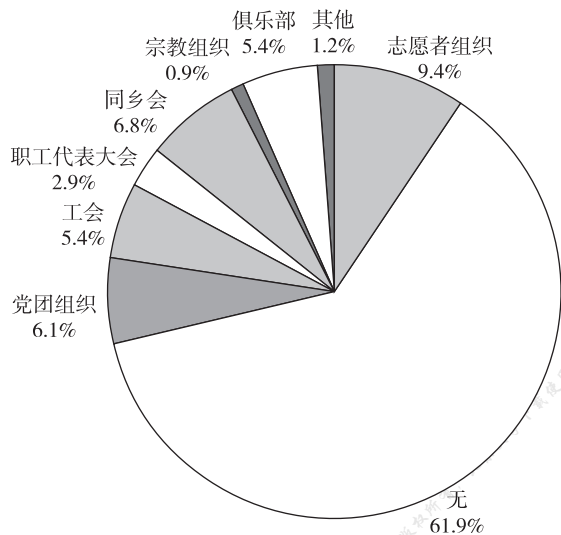


图 13 在北京参加的组织或群体

农民工状况调查”数据发现，参与社区组织对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有显著影响，表现为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新生代农民工比没有参加过社区组织的更倾向于不认同农民身份。<sup>①</sup>

当前，80.6%的务工青年希望企业或政府提供平台以满足他们对于户外活动、文娱活动等文化活动的需求。因此，政府需要加强基础活动场所、设施诸如公园、运动器械的建设，企业则要根据员工需求开展各式各样的文化活动。

与2012年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相比，“农二代”群体无论是在社会组织 and 群体的参与程度，还是在各类城市生活上都没有明显不同，尽管他们在京的时间更长。唯一的不同在于，“农二代”更多地表现为“知情”情况下的主动不参与；而新生代农民工“不知情”的比例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了农民工群体制度性城市融入的艰巨性，也为各类组织为农民工群体提供融入机会指明了改进方向。

### 3. 文化、心理融入

已有的移民社会融入理论及相关研究表明，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是移民

<sup>①</sup> 许传新等：《新生代农民工的身份认同及影响因素分析》，《学术探索》2007年第6期。

社会融入的最高境界，对于外来农民工群体来说，只有在这个层面融入主流社会，他们才真正融入了城市。这种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一方面，表现为“农二代”群体对北京这个城市的态度及评价；另一方面表现为他们对自身城市身份的认同。

### （1）城市认同

本次调研的被访对象中有 44.3% 的人表示对北京“非常喜欢”或“比较喜欢”，41.8% 的人表示对北京的态度为“一般”，另有 13.9% 的人对北京的态度为“不太喜欢”甚至“非常不喜欢”。“农二代”群体对北京的态度与其城市身份认同呈正相关，即“觉得自己是北京人”的人与“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的人相比更喜欢北京。

59.3% 的被访对象表示“非常关心”或“比较关心”北京的发展，高于“喜欢北京”的比例。31.3% 的人关心程度为“一般”，另有 9.3% 的人对北京的发展表示“不太关心”或“很不关心”。对比 2012 年新生代农民工的调研数据，相对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农二代”群体在对北京的喜爱程度及对北京发展关注程度上并没有显著不同，尽管他们有更多的在北京成长和生活经历。这表明外来农民工群体在文化和心理层面的城市融入仍将是漫长的发展过程。

### （2）身份认同

“身份认同是指流动者与本地人及老家人之间的心理距离、归属感及对自己是谁、从何处来、将去往何处的思考及认知，是社会融入的重要指标。”<sup>①</sup>并且，现有移民研究已表明，身份认同层面的融入对子代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大于对第一代流动人口的重要性。对“农二代”在京务工青年来说，尽管他们可能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只有当他们对北京有很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时，只有当他们认为自己是当地人时，他们才能真正融入城市主流社会。因此，身份认同是城市融入的最高境界，与其他层面的城市融入相互作用。但是，其他维度的融入不一定导致身份认同；即便外来务工人员在其他层面（如经济、生

<sup>①</sup> 杨菊华：《从隔离、选择融入融合：流动人口社会融入问题的理论思考》，《人口研究》2009 年第 33 卷第 1 期。



活方式)有了较程度的融入,他们仍可能始终保持一种异乡人的心态。

尽管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对老家的记忆渐已模糊;尽管所居住的社区并没有明显的社会区隔、人员结构并不单一;尽管只有极少数(13.9%)人“不喜欢”或“非常不喜欢”北京这个城市;尽管也有一定规模的北京朋友,但仍然有81%的被访对象觉得自己“不是北京人”,仅有19%的人认为自己是北京人。尽管存在群体内部差异,仍然可以说,对北京缺乏归属感和地域认同已经成为“农二代”务工青年遭遇的普遍性问题。不过,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自我认同为“北京人”的比例还是有所提升的(2012年数据,新生代农民工中仅有7.5%的被访者自我认同为“北京人”)。

对于不认为自己是北京人的务工者来说,没有北京户口(86.8%)、在北京没有自己的房子(82.6%)、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56.3%)是他们“非北京人”自我认识的最主要原因(见图14)。通过深度访谈,也确证了身份问题对“农二代”造成的困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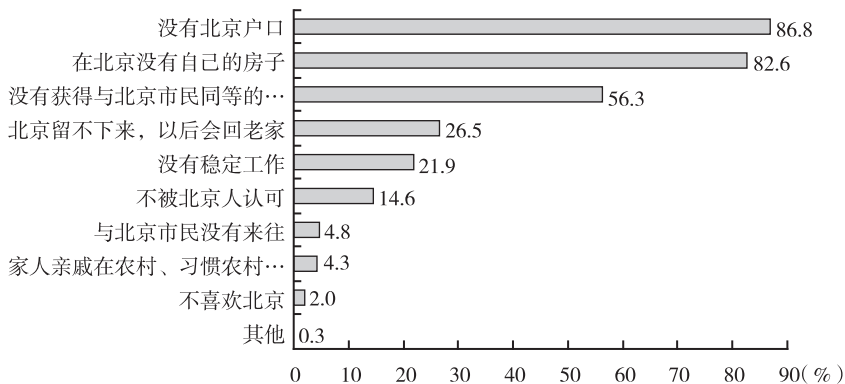


图14 觉得自己还不是北京人的主要原因

**[案例资料5]** 以后有了孩子麻烦事儿还多着呢,最纠结的,就是在北京的一个身份的问题,如果双方有一个有北京户口就没有这个身份问题。我自己已经无所谓了,考虑最多的还是小孩的问题。如果在北京买房,对于我来说,也不是大问题。只不过,我现在也没有资格在北京买房,社保满五年才有资格。

被访的“农二代”群体成员最愿意接受的称呼是“流动青年”(58.10%)、“新居民”(48.10%)这样中性的、模糊的、没有地域归属含义的称呼。四成人愿意接受“外地人”“打工者”这样的称呼,对“外来工”“农村人”“农民工”的接受程度则很低。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群体的乡土性身份认同大为下降。与新生代农民工相比,他们对“流动青年”、“新居民”这两种说法的接受程度明显提高。

“农二代”群体从小远离农村生活,有的出生在城市,年幼时获得的、从父母和祖父母教育中接纳的农村生活经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逐渐淡化,对家乡文化的了解以及对家乡的认同都在消退,家乡的心理距离日渐拉大。另外,他们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城市主流社会之外,依旧是无根的漂泊者。因此,“农二代”群体对自己的身份总体认知和评价呈现出模糊性、不确定性和内心自我矛盾性,是心灵上漂泊的一代。他们在城市中漂泊、在归属感中彷徨,不断追问“我是谁,从何而来,到何处去”,导致认同困境与身份焦虑,遭遇“谁也不是”、“谁也不属”的迷惘。深度访谈还揭示出“农二代”的身份认同并不是简单的非此即彼,而是非常复杂和微妙的,身份认同在其普遍性的意义之外,每个“农二代”个体对此又有着自己的体味:

**[案例资料6]** 我感觉自己来北京好多年了,也没有特别外来的那种感觉,我当然也没觉得自己是北京人。我其实也不是很在乎什么本地人外地人,我接触的人也不是很在意。有时候别人说河北人,我一想我就是河北人。我就觉得一说河北人我就很有归属感,但是一说邯郸我就没感觉,因为我其实对邯郸市里根本不是很熟,如果说我是我们村的,我是很有归属感的。

**[案例资料7]** 跟北京的感情很纠结,也不知道如何表达。在这儿也没什么,走了也没什么牵挂,就像一个驿站。结完婚之后,我也在想一个问题,我经常想的就是以我现在这个阶段,留还是不留,对我影响不大。如果有了孩子,如果我在北京有居住证,我的这个“农三代”还可以上学,如果没有居住证就什么都没有。回到老家,圈子更小,老家资源



少，小地方“拼爹”更严重，现在也很矛盾。留在北京收入高、消费高，回到老家，收入少，生活稍微安逸一些，但老家各种公共设施都不齐备，现在连个电影都看不了。如果在北京有更好的机会，我会选择继续留在北京。

**[案例资料 8]** 小邱说不在意别人对自己的称呼是“务工青年”还是“农民工”，抑或是其他的称谓。小邱只一心一意地对自己的北京梦充满了激情与憧憬——三十岁之前在北京站稳脚跟，有一份事业和不错的收入，还有一套房子，是他对自己的期待。

#### （四）影响城市融入的主要因素

##### 1. “城市融入”复合指标及该群体的一般状况

根据调查问卷中的 8 项指标（涉及“觉得是否北京人”、“觉得北京人是否热情”、“朋友中是否有北京人”、“是否受到过歧视”、“跟周围的北京同学是否有区别”、“居住是否有区隔”、“是否喜欢北京”、“未来是否会留在北京”），复合生成“城市融入程度”这一综合性指标，以“融入系数”来表示，取值范围在 0~1 之间，数值越高，表示融入程度越高。计算得出务工人员群体的“融入系数”为 0.51，处于一个中间水平。

##### 2. 城市融入的内部分化

“农二代”务工人员作为一个群体，依据其各个成员不同的社会属性特征仍然有复杂的内部分化，部分社会属性会对他们的城市融入水平产生积极或消极影响。根据本次调研数据，统计上显著对“城市融入”复合指标得分产生影响的社会属性主要包括以下因素。

（1）职业：不同职业有着不同的城市融入水平。除了小样本的农业劳动者、废旧物资回收人员之外，以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的融入水平最高，以运输业劳动者最低。

（2）行业地位：按行业地位的不同，城市融入指标的得分呈现出一条抛物线，个体商贩和老板的得分最低，初级管理人员的得分最高。

(3) 劳动状态：劳动状态越稳定，越有制度和合同保障，越容易促进城市融入。

除此之外，影响城市融入的因素还包括：

(4) 时间的力量：来京年龄和居住时间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农二代”初来北京时的年龄越大，北京融入的程度就越低。在北京居住越久，北京融入的程度就越高。

(5) 空间的作用：房屋购买与家庭流动

居住情况不同的群体之间，在城市融入指数上存在显著差异：“自己家买房”的情况好于其他任何一种情形，“住在亲戚家”好于租房，租楼房好于租平房，独租好于合租（或集体宿舍）；搬家次数越少，融入程度越高。

(6) 家庭的功能：完整性的意义

家庭的完整（如有伴侣且伴侣在北京、父母都在北京）扮演着对北京融入非常重要的角色；相反，如果婚姻关系尚未组建或存在异地生活的情况，或者父母不在身边，将会阻碍“农二代”群体的城市融合。

(7) 资本的助力：政治、经济、文化

如果将“政治面貌”看做是政治资本的一部分，“家庭每月总收入”看做是经济资本的代表，“受教育程度”看做是文化资本的体现，可以说，各种资本的增长都会带来城市融入程度的提高。

## （五）“农二代”城市融入特征与障碍

### 1. 特征：多层次城市融入密切互动，发展不平衡、不同步

务工人员在城市中建立怎样的社会网络、与哪些人交往、是否参与社区公共活动等都会直接关系他们是融入正规经济领域还是非正规经济领域。同样，务工人员生活方式也会加速或延缓他们对城市文化的了解、认同与接纳，决定他们是融入主流社会还是亚文化中。与北京当地人的频繁交往加速务工人员对城市文化的了解和掌握，促进其融入主流文化体系中，相反，拘泥于老乡的圈子既是排斥流入地文化的行为表现（至少是对其缺乏足够兴趣，也可能是根本无法融入），也终将被流入地排斥。可见，经济融入、社会融入、制度融入以及文化融入、心理融入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十分密切的。



同时,在“农二代”务工人员群体中,又可以看到不同层面的城市融合发展是不平衡、不同步的,总体而言,社会融入快于制度融入、文化融入和心理融入。这表现在生活方式上,尽管“农二代”群体的闲暇时间不多,但他们的休闲娱乐方式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多元化、现代化、城市化了。在人际交往方面,业缘关系这种城市性的社交关系已经在“农二代”群体的人际网络中占据最重要的位置,这意味着他们的社交网络更具有开放性、异质性、多元性,将对城市融入产生积极影响。但是,在制度融入方面,“农二代”务工人员对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仍然非常低,与新生代农民工群体并无明显差异,尽管他们在北京的生活时间更长、社会关系网络更稳固。此外,在文化、心理层面,“农二代”群体对北京的喜爱及关注程度与新生代群体无明显差异。在身份认同方面,自我认同为“北京人”的“农二代”务工人员比例高于新生代群体,同时他们也更愿意接受“流动青年”、“新居民”这样缺乏地域归属的称呼,漂泊无根、缺乏归属感和认同感现象在“农二代”群体身上得到了更为鲜明的体现。

## 2. “农二代”城市融入障碍

### (1) 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下的城市融入受限

城乡二元结构特别是以户籍管理制度为标志的城乡分割是农民工城市化及城市融入的最大障碍。户籍制度被认为是一种“社会屏蔽”制度,即它将社会一部分人屏蔽在分享城市资源之外。在现行制度安排下,农民工群体面对的是一系列有别于城市居民的就业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医疗制度和教育制度。作为受过良好教育的一代,“农二代”务工群体主观上也已经对这一境况有明确的认知,这在本次调研中体现在他们将“没有北京户口”、“在北京没有房子”、“没有获得与北京市民同等的待遇”作为他们觉得自己还不是北京人的主要原因。

### (2) 低社会参与、各类组织及群体对农民工的关注和吸纳不足

公共意识在人性中普遍存在,公民通过公共参与感到自由的尊严并获得存在的意义。不仅如此,公共意识看重的基本价值是社群福祉、团结、承诺和归属,并认为这些价值的意义在于为社会共同体提供全体成员共享的生活本质,成员将会因为参与共同体的活动而体会到这种生活本质和这种深层的分享关



系,进而产生共生感和认同一致感。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制度融入是外来务工人员城市融入的重要环节。本次调研结果显示,“农二代”务工人员对城市社会组织及群体、城市公共生活的参与度仍然非常低。超过60%的被访对象没有加入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社区组织、党团组织、企业工会还是其他各类社会团体,对“农二代”的容纳度都很低。在公共生活方面,企业、社区、政府为“农二代”务工人员群体提供的公共活动尚不能满足他们的活动需求。这一状况不利于“农二代”的城市融入。

### (3) 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与城市文化的冲突

文化层面的融入受制于、反过来也加速或阻碍外来务工人员在城市的经济融入过程;文化融入还作用于外来务工群体在城市中的行为适应,使他们更好地适应主流城市文化。同样,理念上对城市文化的认同也会促进务工人员的城市身份认同。文化、心理层面的融入对整体的城市融入至关重要。

尽管“农二代”群体作为在北京成长、工作甚至北京出生的一代,他们的生活方式和人际交往与老一代农民工及新生代农民工相比更为现代化和城市化了,但由于其在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上与城市居民的差距,尤其是城乡二元体制下边缘化的外来身份,使他们的价值观念与生活方式仍然与城市主流文化有所隔阂。这体现在被访对象在谈及与北京市民交往中遇到的主要困难时,被提及最多的困难就是“思想观念”、“生活习惯”和“地位差异”。

## (六) 结论与政策建议

如前所述,“农二代”童年和少年的社会化基本上是在城市完成,无论从行为特征还是情感价值倾向看,他们都已经成为城市化的青年。这一认识,应该成为针对“农二代”的所有讨论和政策建议的前提。

### 1. 结论

基于以上调研数据的分析,我们认为北京“农二代”的现实处境与群体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他们是“回不去、留不下”的一代;他们是“追求稳定”的一代;他们还是“诉求抗争力强”的一代。

#### (1) “回不去、留不下”的一代

“回不去、留不下”的现实处境,主要是指城市为本、逐渐疏离农村的



“农二代”已经无法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回乡寻根，延续原有的乡村生活方式；同时，由于种种制度壁垒与相关保障的缺失，他们又无法同城市居民一样在城市稳固扎根。

不论从客观条件还是主观意愿上看，“农二代”都是“回不去”的一代。如前所述，“农二代”不仅在地域上远离家乡农村，在生活方式、情感上也已与老家渐行渐远。首先，大部分“农二代”在北京居住的时间比在老家更长，北京是他们最主要的生活空间。由此，他们也将完整的家庭移植过来，超过九成的“农二代”是以家庭形态生活在北京。父母、孩子都带入北京生活，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老家逐渐失去“根”的意义，降低了“农二代”回老家的可能性。其次，长时间生活于北京，使“农二代”的生活方式趋于城市化，他们在城市中的生活方式、闲暇活动以及生产方式等已与城市市民无异<sup>①</sup>。这一代的务工青年，即便是回到家乡农村，也已无法适应农村的生活与生产方式。最后，生活空间与生活方式不断疏离乡村向城市靠拢的客观情况，必然影响“农二代”的选择意愿。在谈及未来计划时，大部分的“农二代”在主观意愿上倾向于选择城市而非农村，甚至连选择回到老家农村的比例都很低，明确表示将来要回到老家农村的人占总数的比例不到十分之一。从意愿上看，“农二代”将来回乡的可能性基本上不存在。

如果可以选择，大部分“农二代”在主观上愿意留在北京。但某些制度与文化上的区隔，为他们在城市扎根设置了重重障碍，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留不下”的一代。制度层面，最突出的是二元分化的户籍制度，这种社会封闭的制度将“农二代”排斥在分享城市资源之外。它带来的后果是在就业、医疗、社保、教育等方面，“农二代”无法享受与城市居民同等的待遇，这从根本上阻滞了“农二代”的城市融入，也导致他们在城市生活中不断被边缘化。调查数据表明，“农二代”对各类城市组织、群体、社会活动或公共生活的参与度很低<sup>②</sup>。低程度的城市公共生活参与又进一步加深了“农二代”与城市居民在生活习惯、价值观念等文化层面的隔阂。即便如此，在考察

<sup>①</sup> 参见报告“城市融入”部分。

<sup>②</sup> 参见报告“‘农二代’城市融入障碍”部分。

“农二代”留京意愿时，近一半被访者选择愿意留在北京；虽然也有近四成的被访者未能给出明确答案，但深度访谈给我们的启示是，这部分人的徘徊未定，很大程度上不是他们主观上不愿意留在北京，而是基于对不被接纳现实的认识，很大程度上是他们对于未来没有信心的一种反映。因此，“留不下”并非“农二代”主观意愿上的选择，而是制度区隔所带来的现实困境。

## （2）追求稳定的一代

虽然制度层面给“农二代”的城市生活带来了重重障碍，但他们依然选择努力在城市中扎根。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表现出追求稳定城市生活形态的明显特征。家庭迁移的模式使大部分“农二代”在城市中拥有完整的家庭形态，这就催生了“农二代”对“稳定”的高度需求。调研发现，“农二代”对“稳定”的追求表现在生活与工作两个层面。

生活上，“农二代”已经不像第一代农民工那样，为生计而奔波于不同城市之间，被访者中有一半的“农二代”的生活空间仅限于北京与老家。在北京生活期间的流动性也不强，这反映在他们在京的搬家次数上，只要条件允许，他们都尽可能减少搬家的次数。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稳定住所的需求甚至超过对工作的需求。在深度访谈中，许多被访者表示，他们优先考虑选择稳定的住所，然后在住所周边找工作。在调查问卷中，被访者回答“最希望得到的帮助”这个问题时，“稳定的生活”成了他们首选的项目。

在工作层面，更反映出“农二代”主观上对稳定的追求。总体上看，“农二代”更换工作的频率不高，四成“农二代”在北京没有换过工作，超过七成的“农二代”属于比较稳定的工作状态；在所从事行业中的位置，大部分“农二代”处于流动性较低的“普通员工”位置；与其父辈（第一代农民工）相比，他们从事小商贩、自我经营等流动性强的职业的比例明显下降。同时，大部分“农二代”在工作中倾向于签订劳动合同，他们也意识到，签订劳动合同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工作的稳定性。

一方面，“农二代”在生活和工作上的稳定性明显高于第一代农民工。父辈的奋斗打拼为“农二代”在城市落脚提供了一定的经济与物质保障，“农二代”自身教育水平的提升也为其选择相对稳定的职业提供条件；另一方面，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在主观上也更加追求稳定。毕竟，



对于在城市中拥有完整家庭的“农二代”，稳定的住所可以大大降低他们供养家庭的成本，稳定的工作也为其家庭生活提供基本经济保障。城市中，“农二代”对稳定的偏好与追求，是他们对“回不去”现实困境的应对策略，也是他们试图扎根于城市的直接表现。

### (3) 诉求抗争力强的一代

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农二代”虽然在生活条件上有了很大提高，但因为长时间生活在城市，在相对剥夺感上的体验比第一代农民工更加深切。同时，“农二代”的受教育情况也比第一代农民工好，教育水平的普遍提升加深了“农二代”对现实不平等处境的认识，由此带来了他们在教育、医疗、住房、社会保障等各个方面平等权利的诉求。从这个意义上说，“农二代”比第一代农具有更强的公平与权利意识。

“农二代”“诉求抗争力强”的特征不仅表现在各个层面公平权利意识的增强、相关利益诉求的表达上，还表现在当他们遭遇不公正待遇时积极寻求多元化的解决方式。他们不仅懂得通过法律、政府部门等制度化的方式捍卫自身的权益，还会通过寻求亲缘、乡缘、业缘等社会关系帮助，以及利用网络、媒体曝光等非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抗争。

“农二代”的社会关系结构在悄悄发生变化。他们不仅将亲缘、乡缘和地缘等传统的社会关系网络移植到城市中，而且由于长期在城市中接受教育和工作，业缘关系对于“农二代”的重要性也在不断提升。从他们的朋友来源类型看，排在第一、二位的是“同学”、“同事”等业缘社会关系，而乡缘、亲缘和地缘等传统的社会关系——“同乡”、“亲戚”和“邻居”被排到了次要位置。社会关系网络是集体行动动员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农二代”社会关系结构的变化，尤其是业缘关系重要性的上升，也必然影响今后“农二代”利益诉求与抗争方式的走向。

## 2. 政策与建议

“农二代”的未来，不仅关乎这个群体本身的利益，而且由于他们身上寄托了其父辈辛苦打拼的希望，他们的未来也关乎第一代农民工的利益。“农二代”问题的解决，需要国家层面的统筹部署，如通过新农村建设，吸引部分“农二代”回乡务农创业；通过城镇化建设，吸引部分“农二代”回到中小城

镇工作生活。但是，本次调查的结果表明，基于“农二代”“回不去”、“追求城市稳定生活”的现实处境与特征，将他们直接引导回乡或到其他城市的可行性并不高。因此，北京市“农二代”问题的解决，主要是北京市政府的任务，亟须北京市出台相关政策，实施相关举措。在各个外来人口群体中，“农二代”既是城市融入诉求最强烈的群体，也是社会适应程度最深的群体，率先解决这个问题显得尤为必要和紧迫。

本文分别从制度与技术层面提出一些对策建议，以期通过制度手段保障“农二代”的相应权益和改善其物质条件与经济状况，并通过技术手段促进“农二代”的城市融合、降低冲突抗争的发生率。

### (1) 制度层面

1) 制度屏障是“农二代”城市融入的主要障碍，应尽快出台让“农二代”群体看得到希望的户籍制度改革措施，不断探索既适应北京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为“农二代”提供一定保障的户籍政策。对在京工作一定年限、有固定住所和职业、连续缴纳社会保险达到一定年限的“农二代”，为其办理进京户籍。由此保障“农二代”在就业、医疗、社保和教育等方面的权益，在制度层面将他们纳入城市。

2) 从制度和规划上整体考虑包括“农二代”在内的农民工群体的住房问题。如上所述，追求稳定已经成为“农二代”城市生活中的最高需求。而对于在城市中拥有完整家庭的“农二代”而言，为他们提供维持家庭生活的基本住所条件，将具有重大意义。针对“农二代”的实际需求和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运用政府支持、市场融资和农民工集资等多种手段来建造廉租房，逐步解决“农二代”在城市的居住问题。根据北京的实际情况，应正视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已经成为城市低端人口集聚地的现实，结合城中村和城乡接合部改造计划，创新农村集体土地使用制度，将现有出租屋改造成为“集体土地廉租房”，为符合条件的“农二代”提供合法稳定的居所。

### (2) 技术层面

1) 搭建网络平台，加强政府与“农二代”群体的信息沟通。

互联网已经成为“农二代”务工人员群体获取信息的主要来源。他们从政府部门获取信息的机会不足，这表现在他们对政府信息较高的信任程度和极



低的实际使用上。针对这一状况，政府方面可以搭建适合的网络平台。通过这一平台，一方面，政府可以更有效地传达正面、主流的价值观念及与“农二代”群体切身相关的政策信息；另一方面，“农二代”群体也可以通过网络更顺畅地向相关政府部门表达他们的利益诉求，网络平台的搭建将有利于形成政府与该群体间的良好信息互动。

### 2) 发挥社会组织及群体的引导作用。

“农二代”务工人员群体对各类社会组织及群体的参与程度很低，他们在遇到不公正待遇时自然很少向这些组织及群体求助。这表明，各类社会组织对农民工群体的关注和吸纳不足，若能及时转变观念及发展策略，有望在引导“农二代”务工群体用适当方式争取权益方面发挥更大作用。可能的方式包括在社会层面通过社区组织、在政府层面通过共青团组织、在企业层面通过工会组织更多地对该群体进行吸纳及引导。

### 3) 提升法律意识，加强法律知识培训及法律援助。

由于自身受教育水平的提升，“农二代”务工人员群体与第一代及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相比，已经更倾向于通过法律途径解决面临的不公正待遇。同时不能忽视的是，“农二代”群体的法律知识及实际运用水平仍然有限，有必要为该群体提供更多的法律知识培训及相应的法律援助，以减少其进行体制内利益诉求的成本，逐步引导他们诉求抗争方式的制度化。

## 二 农民工子女教育与阶级再生产

20世纪90年代之后，人口迁移的家庭化趋势出现，随之而来的是流动儿童规模的迅速扩大。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显示，我国流动人口总量已达2.21亿，同年，国家人口计生委在106个流入地城市进行的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0~14周岁人口占全部流动人口的18.8%。据此推算，截至2010年，全国14周岁及以下的流动儿童数量已经达到4155万人，这个数字在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时推算为1410万人，也就是说十年间增长了近200%。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的移民不同的是，中国农民工虽然工作在城市，户籍却仍然属于农民，城市并没有为他们的居住、生活、发展提供相应

的制度性安排。流动儿童的教育问题引发人们广泛的关注，也使得城市流动人口相关政策的滞后在教育层面凸显。

早在2000年，全国第五次人口普查数据已经显示核心家庭举家迁移成为人口迁移的主要形式。2006年北京市人口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北京市常住人口家庭户调查”数据显示，被访流动人口家庭举家迁移的比例为41.2%。到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时，6~14岁的外来学龄儿童为24.9万人，占常住外来人口的3.5%，占全市学龄儿童的28%，与2000年人口普查时相比增加了13.4万多人。

我们的调查主要在北京市海淀区城乡接合部的外来人口聚居区L村展开。随着近几年一些流动人口聚居村的拆迁，越来越多的流动人口涌入L村，在L村的近2万名居民中流动人口占约16000名。调查的资料和数据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通过L小学向流动儿童及其家长的问卷调查，二是对有适龄儿童的外来人口家庭的入户访谈。

### （一）动荡的生活和转学经历

对L小学流动儿童家长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受访者在京的平均居住年限长达10.2年。然而，对这些外来家庭来说，“常住”并不意味着“稳定”，他们的住所、生计乃至心态都呈现一种特殊的动荡状态。

谢晓飞今年10岁，在老家内蒙古赤峰出生一个月后就随父母来到了北京，几年后妹妹出生，一家四口一直在北京生活。尽管如此，晓飞一家的生活并不稳定，搬家成了常态。她妈妈说：“我们最早来北京的时候就住在六所（L村附近工厂）边上，住了一年多，我那会儿没工作想找点活干，就搬到了T村。后来闹‘非典’说T村有病人，我们就搬到L村。但是L村这边幼儿园不收外地小孩子，T村那边收，2005年就又搬到T村，住了一年多。后来又搬回这边，这些年净搬家了。”晓飞一家来京后在海淀西北搬了四五次家，原因分别为找工作、躲避“非典”和孩子入园等。

对流动儿童来说，“居无定所”的直接影响就是导致他们不得不频繁转学。王国盛来自河南信阳，2000年前后，他爸爸只身来到北京打工，三年之后，王国盛和妈妈、妹妹来北京与爸爸团聚。因为父母是颐和园的流动摊贩，



他家最早就租住在颐和园附近，后来王国盛独自寄居在 L 村的舅舅家中。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过了两年，父母和妹妹才搬到 L 村与王国盛同住。在 L 村的租房生活也并不安定，因为与房东的用电纠纷，王国盛家半年前又搬了一次家。住在颐和园一带时，王国盛就在附近的打工子弟学校 H 小学读二年级。随着部分生源不足的公办小学对流动儿童放宽入学限制，王国盛参加了 L 小学的入学考试。在入学考试中，成绩优异者可以正常升学，成绩一般者也可以入学，但需要留一级，成绩太差的则无法入学。成绩平平的王国盛进入 L 小学，但多花了一年时间重读二年级，之后才在升学的道路上步入正轨。与王国盛同时参加转学考试的同乡王雅馨则因为考试时涉嫌抄袭，被 L 小学拒绝接收，她只得回 H 小学继续读。一年之后，王雅馨再一次参加了 L 小学的入学考试，这次她幸运地通过了考试，但因成绩较差，只能从二年级读起。这样，王雅馨读二年级就花了三年的时间，加之在农村老家时入学较晚，现已 14 周岁的王雅馨仍然在读小学六年级。

频繁转学也会在学业上给流动儿童造成困扰。谢朝霞老家在四川一个比较偏僻的农村，她的父母十几年前就来到北京打工，她则跟姐姐留守在老家。由于村里的小学只到三年级，谢朝霞到四年级时只得转到乡中心小学，没过多久，她感到学习吃力，父母便怀着给孩子补习的心态将她接到北京读书。因为 L 小学不收插班生，爸爸便将谢朝霞送到了海淀打工子弟学校 Y 小学，四年级读完之后，又将她送回老家中心校读五年级。六年级时谢朝霞再次到 Y 小学读书，现在在海淀区的公立学校 F 中学读初二。在老家村小、中心校和北京打工子弟学校、公立学校之间的辗转就学经历让谢朝霞很是困扰，不同的科目、教材和教学方式让她颇为不适应。她常说自己因为总是转学基础不好，英语成绩即使和毕业于打工子弟学校的同班同学相比也差一大截。

除了搬家、转学这种明显的动荡，不确定和漂泊感实际上弥散在流动儿童日常生活中。在 L 村，这些家庭无一例外的是租住本地村民的自建房屋，简陋的房间里除了最基本的床、桌子、电视等就再没有其他像样的家具了，屋内堆积着许多包裹的家庭并不鲜见，总体上给人一种“暂居”的印象。这种居住状态一方面当然与打工者的收入不高有关，另一方面同样产生影响的则是流动人口的特殊心态，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对于 5 年后自己可能的去处，



近 50% 的人认为自己仍然会待在北京，但也有接近四成的人表示“说不准”，这种不确定性导致他们投资居住条件的积极性极低。对于未来生活的规划和期望，我们听到最多的说法是“走一步看一步”。流动儿童在漂泊中成长，这种生活经历对他们的心理发育、地域认同和社会交往等更长远的发展有怎样的影响，是一个值得持续关注的问题。

在 L 村，看到“希望社区”的成立为积极干预的模式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尝试。当流动儿童每天到“希望社区”与社区工作者及同村的孩子们一起学习、活动、玩耍的时候，实际上也是在感受社区的“在场”，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感。希望社区的一系列活动也在有意无意地促进着流动儿童对自己所生活的这片村庄社区的了解和认同，比如组织孩子们走访整个社区、手绘村庄地图、到村边的山上郊游等。

## （二）边缘化的学校教育

北京市流动儿童的数量可观，伴随着国家政策的明朗化，尤其是 2001 年 5 月中央出台“以流入地区政府管理为主，以全日制公办中小学为主”的农民工子女教育“两为主”政策明确地方政府的法律责任之后，北京市公办学校放松了对流动儿童入学的严格限制。据北京市教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11 年北京义务教育阶段外来农民工子女共约 43.37 万人，70% 以上在公办中小学就读。<sup>①</sup>

由于中央政策的引导、流动儿童规模的扩大和舆论压力等原因，城市政府相关部门放松了对流动儿童进入公办学校的限制，使得矛盾相对缓解，然而现实中流动儿童大多被安置在城市教育的边缘地带，接收流动儿童较多的学校大多位于城乡接合部，市中心的那些优质教育资源基本上与流动儿童无缘。国家层面的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并未完善，欠缺明确的操作方案设计，在现行地方负责的义务教育财政体制以及城市滞后的管理思路下，流动儿童获取与城市儿童平等入学的机会仍然困难重重。

<sup>①</sup> 中国日报网，[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shbt/2011-08-31/content\\_3653464\\_2.html](http://www.chinadaily.com.cn/hqsj/shbt/2011-08-31/content_3653464_2.html)。



我们看到，现在的情况与20多年前相比确实有了很大的改善。对居住在L村的这些有相对稳定生计的外来人口而言，送子女进公立小学似乎已经不再是不可解决的难题。但是，向义务教育阶段的流动儿童开放公办学校，其政策效果如何，还要取决于其他配套制度和政策，尤其是要解决义务教育阶段之后的教育瓶颈问题。我们发现，尽管义务教育阶段对流动儿童的入学限制有所松动，但是由于没有触及户籍制度、高考制度这样更强的结构性因素，流动儿童即便在义务教育阶段顺利地在流入地城市入学，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对他们来说也并没有消失而只是延后了。不是回老家与否，而是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让孩子回家才是流动人口家庭的选择所在。

郭晓乐是L小学的五年级学生。郭晓乐的父母经过多年打拼，2012年已经在老家山东泰安的县城里买了房子，打算等晓乐五年级读完后就带他回去，夫妻俩在县城做些小生意，晓乐就近上学。同样打算陪孩子回老家读初中的还有唐宁的父母，他们希望唐宁能尽早适应老家的教学。与继续漂泊或者被迫远离父母的孩子相比，郭晓乐和唐宁无疑是幸运的，他们回家之后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流动儿童或留守儿童，毕业之前一般会比较稳定地和父母待在老家。但是回去之后学业如何，则仍然是个未知数。郭晓乐讲述了他表哥随父母回乡的故事：“我哥原来在北京学习特好，四面墙都是奖状。后来他回老家了，初中差点没考上，（因为）老家的教材难。我哥现在完了，买了电脑之后就是玩电脑，成了学校最下流（游）的学生。”由于流动儿童回老家之后需要重新适应老家学校的环境，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问题，很可能就会导致学业一落千丈，就算父母在孩子身边也没能阻止这样的悲剧发生。

由于打工收入不多，流动人口家庭一般难有积蓄，老家的工作机会又少，能够下决心为了孩子升学举家回乡的毕竟是少数。考虑在北京升学的种种困难，父母单方陪孩子回老家读书也是一些家庭的选择。李文涛现在读二年级，她的妈妈已经把陪女儿回老家读书视为唯一的选择，亲友家的孩子留在北京上初中之后遭遇种种麻烦的实例坚定了李文涛的妈妈送孩子回老家的想法：“我婶婶家的孩子原来就在L小学，学习挺好的，推优推出去了，到了北部新区一个学校。本地的学生学习好的就可以住校，外地的人家就不让住。孩子只能每天来回的坐车，实验班也不接收她，最后还是得回去考。”父母一方的陪伴

对孩子来说可以获得基本的照顾，但这是以一家人分居两地为代价的。回乡的家长不仅要放弃在北京的工作机会，还要放弃正常的家庭生活，在这种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孩子也必然要承受父母一方在教育中的缺失所带来的影响。

对于流动儿童自身而言，他们最不愿意的就是远离父母独自回老家上学，成为真正的留守儿童。陈楠的爷爷、姥姥、姥爷均已去世，年过八十的奶奶也无法照顾陈楠，但父母还是决定让她回老家上初中，正如两年前对陈楠姐姐的安排。对于两姐妹的照顾问题，父母把希望寄托在陈楠一位堂嫂身上。面对这样的安排，陈楠非常抵触，她不愿离开北京，更讨厌寄人篱下，为此她跟母亲几次争吵，但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她不得不独自回乡的命运。

许多流动儿童一出生就随着父母在外流动，尽管他们的聚居地在远离市中心的城乡接合部，他们还是逐渐习惯了城市生活，一旦回到农村老家，很可能被巨大的陌生感和无助感包围。对一年回老家一次甚至多年没有回过老家的他们来说，家乡并不是亲切温暖的，即便对家乡的印象也让他们感到沮丧和压抑。唐宁就曾明确表达过对回老家的抵触：“我想过了六月再回去，反正我就想能多过就多过一点。不舍得，我从小就在北京。我们全班外地同学都不想回家上学。我就喜欢在北京待着，因为老家课比较多，但到高中了我们都得回家考去，我感觉挺压抑的。我大哥和姐姐（大伯家的亲戚）一直在老家上学，学习成绩超好。我想他们周末肯定成天在家里，上完课就回来，回来以后就写作业，写完作业就看书，从来不出来玩。我就害怕我跟不上，就感到压力很大。我对老家一点不熟悉，特陌生。老家肯定没有这边好。”这又让我们想起了郭晓乐表哥的悲剧，许多流动儿童回乡前就已经对老家的学习生活心生抵触，一旦这个适应过程出现问题，很可能彻底厌学，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正是因为回老家读书的种种困难，相当一部分流动儿童会选择留在北京上初中。王国盛告诉我们，他六年级时班里的32名同学中23名留在了北京上初中，其中5人获得推优资格，即可以通过摇号进入市区比较好的公立初中，其余人则去了L村划片对应的W中学。从打工子弟小学毕业的谢朝霞也顺利进入了公办的Y中学。不过我们注意到，升学的渠道是否畅通实际上取决于一些不稳定因素，流动儿童升初中并没有被常规化和制度化。王国盛向我们讲述了他升学的经历：“我原来在L小学，升初中的时候我们在小学里想报名，不



知道为什么就说报不了。后来就毕业考试，考完试之后又给我们成绩可以的发了一封信，也没经过入学考试，就说已经录取了，开学的时候就直接去了。”而谢朝霞进入 Y 中学的过程则显得有更大的随机性，她说：“我小学毕业分校就分到了 Y 中学，哪个中学需要学生就找到我们小学来定。”

为了参加中考、高考，流动儿童在北京的初中学习只能是暂时性的，回老家成了早晚的事，区别只在于他们能有多少时间适应地域分割的教学体系和考试特点。谢朝霞打算读完初二就回老家，虽然她老家四川初中用的教材和北京是一样的，但考试科目不同，教学重点迥异，这让她很担忧。

如果流动儿童在初中之后无法就地升学，尤其是面对高考地域限制这种很强的结构性因素，那么义务教育的开放对促进教育公平的作用将十分有限。选择留守，他们将面临的是在陌生的老家远离父母的缺失感、农村较低的教育质量以及重新适应老家应试教育要求的痛苦过程。选择继续流动，他们则要时时面对何时以何种方式回老家参加中考、高考的抉择，同时还要应对不稳定的城市流动儿童教育政策，在动荡的生活中艰难维持学业。

### （三）再生产阴影下的家庭教育

在制度性障碍之外，流动儿童教育方面的劣势地位也与他们的家庭环境密不可分。布迪厄的文化再生产理论以及伯恩斯坦的“符码理论”都提示我们，由于家庭社会地位低下和经济、文化资本的贫乏，底层阶级的儿童其实早在进入学校之前就已经处于教育上的不利地位。这种阶级地位造成的教育上的劣势在学校中只是被进一步强化了。

#### 1. 居住环境及文化资源

在房租收益的驱动下，L 村的房东将房屋盖得越来越密集，低矮、昏暗、狭小的房屋就成为流动儿童家庭在京的栖身之地。一般三口或四口之家会居住在一个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中，少数和老人同住的家庭会有里外相通的两个小间，问卷调查的结果也显示，超过六成的受访者表示自己的居住面积在 20 平方米以下。除了少数搭建简易厨房的家庭，其他家庭都是一屋多用，做饭、睡觉、起居都在这一个房间中进行。对流动儿童而言，这样的居住条件对他们的学习环境造成直接影响。我们没有发现有写字台或书桌的流动儿童家庭，一般

用小饭桌、柜子等代替，还有的孩子直接在床上写作业。再加上光线昏暗以及同居一室的相互影响，很难想象流动儿童在家里能够专心学习。

即使流动儿童能克服干扰在家中学习，家里能提供的物质资源也十分有限。调研留意了流动儿童家中书籍和学习型电子产品拥有状况。我们发现，流动儿童家长自身极少进行阅读，能主动给孩子买齐学校要求的教辅书就算很不错的了，很少看到流动儿童家里有课外书。家里没有书，一些仍然对阅读感兴趣的流动儿童就把希望社区的小小书柜当做“宝藏”，尽管有种种借阅限制，一些孩子还是乐此不疲地跑到希望社区去看，偶尔还会因为抢书而争吵。这并不是由于希望社区的书有什么特别的魔力，而是恰恰反映了流动儿童家庭文化资源的极度匮乏。除了传统的书籍，如今针对学生的学习需要推出的各种电子产品也层出不穷，如电脑、电子书、电子词典、学习机等，但是这些离流动儿童还很遥远。

## 2. 父母教育程度及学业辅导

本研究中的流动儿童家长全部来自比较落后的农村地区，我们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超过七成的人受教育水平为初中及以下，而接受过大专及以上学历的只占不到5%，父母文化程度较低的一个直接影响就是他们很难搞清楚子女确切的学习状态，更欠缺辅导孩子学习的能力。

唐凯的父母小学都没有毕业，父亲每天上班早出晚归，母亲在家带三个孩子，夫妻双方都会过问唐凯的学习情况，但也仅限于“过问”，问他是否做完了作业。谢晓飞的妈妈也是小学肄业，她无法具体地描述女儿的学习情况，只是笼统地说：“她不爱学习，就贪玩。我开过家长会，老师就是说有的孩子学习跟不上啦，反正就是这些。……我感觉她学习是那样也不行，最主要是数学和英语，语文也不算好。”谈到对谢晓飞的学习辅导，她显得漫不经心：“我对孩子的学习也算关心，哎呀，关键是我什么都不会，关心也教不了她。”

以往研究都表明，大多数儿童会深受父母教育经历的影响，父母的教育失败对他们的学习态度和成就预期等都有负面作用。唐凯的妈妈在访谈时对笔者直言：“他学习没什么变化，从一年级就是中等，到现在还是那样，上进不上去。我想是不是怨家长不识字没法教他，没教出来。他奶奶总是说，别想着他能学习多好，父母都不识字，没门儿。”

由于自身教育水平的限制，不少家长在表明自己对孩子学习的关心时，都



仅仅停留在“要完成作业”“要好好学习”等空洞的口头督促，由于没有针对性，流动儿童对此并不太在意，甚至会产生厌烦心理。尽管子女还处于小学或初中低年级阶段，不少流动儿童家长已经很难确切地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面对家长会等关于孩子成绩差的反馈，他们也不会去确认到底是哪一个科目的哪一项比较差，更难以提供相应的帮助和辅导。与上层阶级和中产阶级家庭中父母对孩子的学习细致入微的观察、引导相比，流动儿童从父母那里得到的帮助实在是太少了。

### 3. 亲子交流

流动儿童与父母的交流不仅机会少、时间短，而且基本上限于饭桌上跟父母简单汇报学习情况。孩子很难从与父母的交流中获取丰富的信息、知识或者心智的启迪。很多流动儿童已经在北京生活多年，但父母极少带他们走出L村，多数流动儿童除了在学校每年组织春秋游时参观鸟巢、科技馆，没有去过其他景点，身在北京并没有让他们感染到城市文明的气息。

话语是一种社会实践，学习语言是儿童社会化过程中的重要部分，通过语言的学习和运用，儿童实际上也在接受一整套特定的文化规则，语言能力的强弱对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表现有着重要影响。流动儿童家庭中使用的语言代码在类型上十分接近伯恩斯坦所提出的“封闭型代码”的概念，这种局限性语言与学校文化中崇尚的“精密型代码”相距甚远。在被访的流动儿童家庭当中，不少儿童在亲子交流方式上跟父母产生矛盾，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语言形式的影响。

廖小强今年六年级，爸爸望子成龙，经常通过言语对他进行说教。廖小强说：“我爸经常一吃完饭就感叹，一大堆话，问我干活累还是读书累，必须好好学习，不好好学就得打工。”廖小强知道父亲不容易，但他对父亲的说话方式并不认同。“我有时候吧觉得家长说话没什么道理，我回他一句，说我顶嘴，就打我。”对于儿子偶尔表现出的不满，廖小强父亲的解决方式则是用家长的权威去压制，不允许孩子辩解。廖小强的父亲其实是非常爱孩子的，但他同时又怀疑孩子的理性，亲子交流的方式不是沟通协商，而只是家长对孩子的单方面灌输和压制。廖小强的例子并不特殊，因对父母的管教方式尤其是所使用的语言难以接受而心生不满的流动儿童并不少见。这种亲子矛盾的存在可能有一些流动儿童进入叛逆期、亲子双方沟通时间不够的原因，也与流动儿童

在学校中逐渐习得的语言形式与父母使用的简单、粗暴的语言形式之间的矛盾不无关系。在这样的家庭语言环境中成长，对他们进入学校之后适应主流话语形式及其背后的一整套社会文化而言是十分不利的。

#### 4. 家长的教育期望

绝大多数流动儿童家长表示会尽一切努力供孩子上学，具体到什么程度则取决于孩子自己的学习状态，显示出对子女教育积极支持的态度。但是如果仔细考量一下，“看孩子自己”其实又是一种暧昧不清的态度，其中传达的意思可以从以下访谈记录中略知一二。

谢晓飞母亲：“晓飞要是能考上大学就让她上呗，肯定要供她呀，她要是考不上咱也没办法。……看她个人能力啦。”唐凯母亲则说：“我看唐凯如果初中之后能在这儿上的话，我就是困难一点也让他上，因为我跟他爸都不识字，愿意让他上，他能懂一点，总是比不上学的强，我就知道我自己上哪去打工人家让填个表我都填不上。”

谢晓飞的母亲和唐凯的母亲的态度很有代表性，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期望可以说是模棱两可的，一方面，他们都知道教育对孩子的好处，希望孩子好好学习；另一方面，他们对孩子学习能力的信心又不足，对孩子的教育要求也仅限于比父母强、将来不要像父母一样做最苦最累的农民工。

农民工对子女的教育期望也有着很强的内部差异，尽管存在种种阻碍，一些打工者仍然保持着对子女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强烈愿望。廖小强的爸爸对他学习要求非常严格，一直以来，无论多困难，他都坚持让小强上公立学校，对他的督促也很紧。小强的爸爸16岁就离开农村老家外出打工，漂泊过大半个中国，吃过不少苦头，现在他和妻子在北京做小生意，生活条件有了改善，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儿子重复自己的命运成为一名打工者，唯有小强顺利升学，才能延续全家人的希望。

谭洋的例子或许可以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流动儿童的学业成就对整个家庭有着怎样的意义。谭洋是在2009年在山东老家读完三年级之后随父母来到北京的，最初他去了打工子弟学校Y小学，由于谭洋在学习上表现突出，不久Y小学的老师便找到他的家长，劝他们将谭洋送到公立学校好好培养。由于教材差异，谭洋在L小学的入学考试中表现欠佳，但在他爸爸多次恳求校长之后，



谭洋最终还是进入了 L 小学。自此，谭洋在学习、文体活动等各方面一直表现优异，六年级毕业时他获得了 L 小学首个“优秀农民工子女奖”。作为优秀生源，他与 L 小学的其他 6 名学生一起获得了推优资格，现在他已经是北京 N 附中初一重点班的班长，积极地为自己的大学梦努力着。谭洋的爸爸在 L 村六所做焊接工，妈妈在中关村服装市场打工，尽管收入不多，但谭洋的学业表现让整个家庭充满了生机和希望。2012 年第一次访谈谭洋的爸爸时，他说夫妻二人来北京打工是为了到大城市见世面、有更高的收入，现在随着谭洋的升学和前途的显现，我们回访时他更多地将在北京的打工生活解释成“为了孩子能得到更好的教育机会”，憧憬着谭洋考上大学之后将给他一家乃至整个家族带来荣耀和改变。对于谭洋未来的发展，他的父母相信他已经不能再回到农村老家，他们相信凭谭洋的优秀能够在北京顺利升入高中，而对于最关键的高考户籍限制问题，他们则把全部希望寄托在相关政策改变上。

面对廖小强、谭洋这样努力上进的孩子，我们很想送上祝福，但是作为对制度因素和结构性背景有着更多了解的研究者，我们又不禁暗暗担忧。对农民工而言，无论他们最初怀着怎样的梦想离开老家，现实的城市都让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感受到了挫折，逐渐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成了许多人重建生活的意义感和成就感的唯一途径。为了孩子有更好的教育机会，他们不惜忍受生活的动荡、低姿态去恳求学校负责人乃至大量投入自己打工的血汗钱。尽管如此，他们还是会发现许多事情自己无法控制，结果要么无处着力的迷惘，要么像押宝一样寄希望于政策改变。如果一旦流动儿童的升学特别是大学梦受到结构性因素强有力的阻碍，对他们自身和整个家庭的打击都将是毁灭性的。

#### （四）流动儿童对未来出路的迷惘

在未来生活的地域选择方面，我们发现流动儿童对北京的留恋是普遍性的。与父辈不同的是，许多流动儿童一出生就在北京，他们与户籍上的“农村”二字并没有多大关联。家乡在他们的记忆中是模糊、陌生的，鲜有的几次回乡经历更多地是让他们感到不习惯而不是亲切。老家农村的各方面条件在他们的印象中远远落后于北京，事实也正是如此。

谈到未来成年后的生活地域选择，流动儿童与他们的父母一代相比已经有



了很大的不同。我们发现，35 岁以上的流动儿童家长几乎都参加过农业生产，30 岁左右的年轻父母则很早就开始外出打工，对农业活动了解较少，但无论是哪种情况，他们大多还是把家乡当做年老之后生活的地方。但流动儿童不仅都不愿意回老家读书，谈到将来的工作地点时也往往会选择北京。唐凯的父母十几年前怀着打工赚钱回老家盖新房的梦想来到北京，第二个孩子的病让他们攒钱梦碎，但年老之后回乡的意愿仍然强烈，认为那才是自己的“家”。但唐凯不仅不愿回老家读初中，而且成人后也不想离开：“长大以后我想一直留在北京，以后回去上高中的话将来我也还是要来北京，工作也在这儿，因为这边好找工作，老家没办法找工作。”同样的，谢朝霞的父母尽管来京已有十余年，“叶落归根”思想也仍然没有改变，而谢朝霞来京时间不长，却已经无意再回老家。“将来我还想来北京工作，首先因为这里人比较好，我碰到的人都比较好。因为北京是首都嘛，条件比较好。各方面都比老家好一些，比如我们老家那边公交车什么的都很不方便，而且老家泥比较多，不好走路。我记得小时候老家一下雨后面山上的泥就都塌下来。”

除了老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低、就业机会少等问题，流动儿童还常常提起老家交通不便、下雨天出门泥多把鞋弄脏等。这些抱怨乍一看只是些细枝末节，但仔细分析，其实表明了流动儿童早已认同了城市的生活方式，老家农村的生活方式已经离他们越来越远。正如一些研究已经指出的，城市在以自己特定的方式塑造流动儿童的心性、气质、观念和认同，这些经历了“日常生活的城市化”的流动儿童再也无法像父辈那样把农村老家作为自己的归宿。无论城市政府和既得利益阶层多么不愿意，流动儿童成年后必定会留在城市。与父辈不同的是，他们不会再往返于城乡之间，对城市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公平和歧视也会更加敏感和愤愤不平。郭晓乐曾主动谈起这样的感受：“我们班 30 多个人，有两个本地的，不爱跟他们一起玩，不是一样的人。我们都不服新来的那个（本地同学），一来就当大队委……没有天理呀，老师太偏向本地人，我们特不服。”在这样的心理状态下，流动儿童成年之后对各种不公平现象有可能会实施激励的对抗行为，更积极地表达自己的不满。

在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方面是流动儿童对教育重要性的认同。他们并不喜欢父母的职业和生活状态，父母和他们自己都不希望再重复这样的人生轨迹。



他们也知道上大学几乎是自己改变命运的唯一出路，但这种认识并没能让他们在学校中付出百分之百的努力。实际上，流动儿童的学习动力是比较低的，现行社会结构下教育制度对流动儿童的种种限制以及家庭不利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失败的教育经历都让他们放低了对自己的教育预期。这种倾向随着年级的增高还有加重的迹象，因为他们更容易看到升学的制度性瓶颈。

谈到对未来的职业预期，流动儿童大多很迷惘，没有想过将来要从事什么类型的工作。在能够说出职业理想的流动儿童当中，有的想当警察，有的想当兵，有的想当老师，还有的想当明星，没有一个流动儿童想继续父母的职业。可以看出，对大多数流动儿童而言，他们一方面想要躲避重复父辈的职业，希望能够有所提升，另一方面对现实中种种限制因素的感知又让他们很难明确地预期自己到底想做、能做哪些职业。喜爱音乐的谢朝霞最大的心愿就是上音乐学院，但当笔者问起她有什么音乐特长时，她回答：“我就是在学校上音乐课的时候听一听。爸妈不让我报音乐特长班，费用是一个方面，怕影响学习也是一个方面。”现在她的打算是：“先考高中吧，如果考不上就让我爸妈安排吧，应该就是会让我读职高什么的。”在义务教育的文化课方面都难以得到平等学习机会的流动儿童身上，他们的艺术梦想被轻易地忽略了。

曾经的流动儿童有些已经长大成人，关于他们的实际去向，已有的研究不多，但开始有一些调查。上海共青团团委与相关部门的一项统计显示，目前上海的农民工子女初中毕业后面临三个选择，少数成绩较好的学生回老家考高中；与父母一起经商、帮工或进入技校等职业学校的占到五成；另有约五成的农民工子女则直接被抛向社会，处于就学就业两难的境地。<sup>①</sup>也就是说，在义务教育阶段之后，选择上高中继续上大学的流动儿童数量稀少，绝大部分散落在社会中或者直接从事比较低端的工作。尽管打工的具体行业分布、打工的目的和第一代农民工有所不同，但他们依然集中在低收入、低保障、低社会声望的次级劳动力市场，他们在城市中的社会经济地位与父辈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提升。

<sup>①</sup> 肖春飞、王蔚、刘丹：《城市高中因户籍难向农民工子女开放》，新浪网，<http://news.sina.com.cn/c/2008-02-18/102914960897.shtml>。转引自熊易寒《底层、学校与阶级再生产》，《开放时代》2010年第1期。

## （五）结论与讨论

教育的社会功能一直都是社会科学关注的一个问题，对于处在城乡夹缝中的流动儿童而言，教育究竟是社会流动的渠道还是阶级再生产的工具？

从学校教育层面来讲，随着教育制度和政策的演变，北京的流动儿童与十几年前相比境遇已经好了许多，公立学校入学限制的松动使得超过七成的流动儿童都得以进入公立学校。但同时也应看到，他们的教育只是被边缘化地暂时安置，公共教育资源的分配不均使得城市儿童集中就学的公立学校与流动儿童集中就学的公立学校的差距非但没有缩小反而一直在扩大。由于户籍制度、高考制度的地域限制，在义务教育的后期阶段，流动儿童始终面临着流动与留守的两难抉择，而任何一种选择都使得他们在教育中处于困境。从家庭教育层面来讲，流动儿童家庭低下的社会经济地位、父母失败的教育经历以及家庭文化资本的缺乏以及不成功的亲子交流经验都会影响到他们在学校教育中的学业表现以及对未来的教育期望和职业期望。他们也想避免父辈的人生轨迹，认识到教育几乎是唯一的向上流动的机会，但在现实的种种打击之下，他们又缺乏追求教育成就的能力和动力。在当前的社会背景和家庭背景下，教育对流动儿童而言更多的是一种阶级再生产的渠道而非向上流动的阶梯。

通过问卷调查发现，当下流动儿童的父母平均年龄约 37 岁，他们与第一代农民工相比已经有所不同。第一代农民工进城时，很多人是抱着挣钱后回老家盖房子、结婚，过上更好的农村生活这样的目的。但这一代流动儿童的父母来到城市的目的越来越多的是为了开眼界、生活方便、使子女获得更多的教育机会等，35 岁以下的父母几乎没有务农的经验，即使家里还保留土地也很难再回去做农民。但是打工的微薄收入不可能让他们在城市扎根，那么在城市滞留多年辛苦打拼的价值又在哪里呢？为了摆脱生活的无意义感，许多人实际上逐渐把长远生活目标转寄在了子女身上，流动儿童通过学习改变命运成为整个家庭的希望所在。如果流动儿童的阶级再生产模式维持下去，在他们成年之后和父辈一样继续集中在低收入、低保障、低社会声望的次级劳动力市场，很可能成为压垮农民工群体生活希望的最后一根稻草。

对流动儿童自身而言，城市不再是短暂的栖身之地，而是他们生长、生活



和未来发展地方，他们留在城市更多的是因为城市有他们熟悉并认同的生活方式，可以退守的“老家”对他们来说早已消逝，他们会有更多的经济独立性和更多的自由，唯有城市才是他们追求人生价值和人生成就的所在。如果阶级再生产模式使他们最终成为新一代打工者，他们也无法再像父辈一样无声地忍受苦和累，而是会对自身所在城市的权利和地位有更高的要求，对针对流动人口的不公和歧视更加敏感和愤怒。

从理论上讲，社会分层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继承与流动需要保持大体均衡。在贫富差距、城乡差距较大的社会中，相对畅通的社会流动渠道是消除差距的重要机制。有学者指出，从20世纪90年代末期开始，中国的社会结构出现了一种定型化的趋势，使得社会沉闷<sup>①</sup>，规模庞大的农民工阶级的再生产必然会加剧社会结构的固化。僵化的社会结构不仅会使得社会底层积聚不满，引发社会张力乃至社会震荡，也会影响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的步伐，使得社会整体丧失效率和活力。因此，流动儿童能否通过教育实现正常的社会流动，不仅关系到这一群体自身的命运，也关系着中国社会能否再造生机以及建设和谐社会的理想的实现。

## （六）政策建议

农民工子女面临的问题的根本解决，当然有赖于户籍制度的改革。可以预料，在各种现实因素制约下，户籍制度的改革尚需一段时日。基于这一考虑，在现阶段我们提出一套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模式，以缓和和化解农民工子女面临的问题。

农民工子女时刻面临着生活压力和心理压力，但是这些困难主要是因为他们动荡不安的生活环境和制度安排导致的。所以，关键在于提升他们在动荡环境中的社会保护和关系网络，寻求正确的人生导向和增强能动性。这需要通过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模式才能实现。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模式重点在于强化农民工子女的权能，恢复和增强家庭、社区和学校之间的沟通合作能力，建立一个多层次社会支持系统，降低社会排斥和歧视的风险，提升他们的身份认同，

<sup>①</sup> 孙立平：《重建社会：转型社会的秩序再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第249~260页。

以及基于自我和群体身份的社会适应能力、保护能力和发展能力。

社区为本的综合服务模式的服务宗旨理念是以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为核心，强化社会支持网络，培养内在权能，增强抵御逆境的能力，促进生涯规划和良好发展。具体举措，首先是要在移民集聚的社区建立社区青少年综合服务中心。把服务中心作为孩子的一个精神家园，吸引孩子来这里活动和学习，同时把服务中心发展成连接家长和学校的桥梁，实现家庭、社区和学校教育的紧密合作。其次，针对流入地的特点，提出有特色的服务模式。流入地服务模式的特点在于立足社区，面向家庭和学校，发展综合服务手段，建立保护性、支持性成长环境，促进农民工子女的身份认同，增强他们的发展能力。

## 参考文献

Bernard. Wong (1982) . Economic Adaptation and ethnic identity of the Chinese. Fort Worth: Harcourt Brace College Publishers. 1988. Patronage, brokerage, entrepreneurship and the Chinese community of New York. New York: AMS Press.

Michael Banton (1957). *West African City: A Study of Tribal Life in Freetown*.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